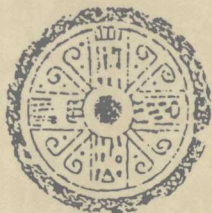


诗赋研究丛书

• 赵逵夫主编 •

兰陵萧氏家族及其 文学研究

杜志强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诗赋研究丛书
赵逵夫 主编

兰陵萧氏家族
及其文学研究

杜志强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杜志强著. —成都: 巴蜀
书社, 2008. 6

(诗赋研究丛书)

ISBN 978-7-80752-167-9

I. 兰… II. 杜… III. ①家族—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南朝时代 IV. K820. 9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5742 号

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

LANLINGXIAOSHIJIAZU JIQI WENXUEYANJIU

杜志强 著

-
- 责任编辑 周田青 王 雷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0.5
字 数 2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752-167-9
定 价 23.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燃出以可宅文言雷动其非突，义舍的夜天泰宅文随则音
式置帝言番奇耀春园中，道林韵音一字一字野集式干由又
；一能韵讲变杂带韵土韵音奏芬同齐整全宗韵土失进院端以四面
。如律而因出美木艺韵副押，为区
卷并园中。韵事逸景土韵本五韵小，韵韵并景土韵本五韵
美》其亦本韵黑。韵并干斗而，集土韵讲文园中干韵并耀春韵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首，中二卷另限个韵韵为韵 大新韵诗式永权去
四，人未韵系景三第，人更申景太其，人园中怪韵新韵去
①。人限类咏入韵并

文学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的艺术。尽管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独特的汉语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轻重缓急和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

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言文字可以比拟。

又由于方块汉字一字一音的特征，中国诗歌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仗、骈丽的艺术美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①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是太多，但也道出了个中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②，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俪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中文化之特质的，是

^① 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1页。

^② 黑格尔认为，哪个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应同该民族的特性、时代观和世界观有关。他说：“在这些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例如东方的意识方式比起西方的（希腊的是例外）就较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就是最真纯的，尽管它还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第27页。

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是诗坛神笔，实亦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辄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可贵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解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术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序

历史的长河有平稳向前的时候，有迂回曲折的时候，也有波涛翻滚、激湍震荡、逆水回旋的时候。这种情形下的流向就显得十分混乱复杂。在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由于人们观察的角度不同，着眼点不同，因而对南北朝时期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较多的分歧。只从文学发展的方面说，在对这个时期一些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也有不少分歧意见。

过去的大半个世纪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上总是强调“总结规律”，研究文学史，就是为的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好像总结规律是研究工作的唯一目的。其实，总结和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弄清哪些事物在历史上起到进步作用，哪些在历史上起了

不利的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为今天的借鉴：哪些作为人类文化的遗产在今天仍然有一定意义，应该继承；哪些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应该摒弃。有的事物与当代已完全不合，但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影响，那么也应适当加以肯定，因为这样可以使人们树立一种观念：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说话、做事应该考虑社会影响，应该为自己的言论和行为负责。肯定在当时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言行，实际上是继承一种社会公德，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南朝的一些文学现象，我以为也并不只是为了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我们必然要从文学本身的方面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但在对一些作家、文学现象的评价上，不能不考虑到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因为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有联系的，不是孤立的。

关于兰陵萧氏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成就得失及相关问题，曹道衡先生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一书（中华书局 2004 年）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对相关历史事件的论述发微阐幽，揭示实质，论述十分精彩；对兰陵萧氏家族中在文学上取得成就的一些人物的评价，也中肯恰当。另外有胡德怀的《齐梁文学与四萧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林大志的《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中华书局 2007 年），在一些具体分析上，均有独到之处。与之相关的还有詹福瑞先生的《南朝诗歌思潮》（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5 年），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 1996 年），胡大雷先生的《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等，都是精审之作。之所以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一时期文学、文学思想的研究，是因为

在南朝尤其在齐梁时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上确实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而其中很多问题又十分复杂，大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萧衍、萧纲、萧绎，他们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物，都终成帝王。孤立地谈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贡献及有关文学的主张，比较容易；但要联系其思想、人格和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就比较复杂。自然，同他们情形相似的有“三曹”，但曹操当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时戎马倥偬，扫平北方诸侯，使北方形成较稳定的政治局面。其作品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与自己壮志难酬的雄心，反映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与愿望，感情是真实的；曹植无论其前期还是后期（自曹丕称帝以后），其作品内容虽有广狭、深浅之异，情调有悲欢与愁畅之别，但情感也是真实的，所反映的也是自己生活之所经历。曹丕之诗赋作品，可以断定为称帝之后所作的不多。自然，曹丕将相当的心思放在拉拢臣僚、收买人心、集中权力、提防可能威胁到他的帝位的几个兄弟身上，但其《禁淫祀诏》、《议轻刑诏》及免灾区赋税、开仓赈济、遣使巡行各地“问民所疾苦，贫者赈货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举孝廉、立太学等举措，也都是有益于社会的，至于其《毁高陵祭殿诏》及遗诏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本家，非很多帝王所能做到。但曹丕在篡汉前后即引导文人倾心辞章，雕琢字句，以“立言”而淡化传统道德观念，又写男女情爱、离愁别怨，尤倾心于揣摩思女怨妇的心情而著为诗章，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不是说在文学史上）立了一个十分不好的榜样。一般诗人、作家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男女之情，并不是什么问题，而南北朝的萧纲、萧绎等在装扮自己世家子弟身份时也专以此为嗜好，虽然说同当时南朝世族腐朽糜烂的

生活有关，但也不能说没有受曹丕的影响。然而无论如何，“三曹”按中国传统的“修辞而立其诚”的原则说，作为当时作家的领袖人物看，也还是当之无愧的；把他们作为一个作家群体来看，也是可以的。曹操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曹植和屈原一样是时代玉成了他，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曹丕称帝前的作品，尽管受民歌的影响，好写儿女之情，但总体说题材还是比较宽的。萧纲、萧绎却从理论上将文学创作完全同思想分开来。萧纲的名言“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一般说来这个道理没错；从创作的心理方面说，确实包含部分的真理。但这却给虚伪阴险的王侯贵族造了一个玩弄女性、倾心声色的理论根据，结果“立身先须谨重”一句便完全成了空话。萧衍的善于权谋和心狠手辣，萧绎残暴狠毒又嫉妒文才之高于己者，史书记载及不少学者的论著中都有论述，此处不说。即萧纲而言，至梁武帝后期实际权力已集中在他手中，由他主事^①，但他并未致力于整肃朝政，消除社会矛盾，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诸弟侄方面。林大志的书中特别对萧纲在台城陷落前后的行为有所考述，认为萧纲同侯景是达成了一种默契，甚至

① 对此，林大志《四萧研究——以文学学为中心》从《南史·侯景传》中举出三条证据：一、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兵至建康，萧纲“入面启武帝曰：‘请以事垂付，愿不劳圣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问为？’”二、侯景攻建康多日，不克，其部将范桃棒欲降，萧衍父子意见不一，“简文以启上，上大悦”。又说到“简文恐其诈，犹豫不决”，萧衍怒，但最后仍由萧纲主之，“简文迟疑，累日不决”，终至“外事泄”，其事遂败。三、太清三年二月侯景诈降，萧衍父子意见又不一，萧衍说：“吾有死而已，宁有是议。”而萧纲倾向于和。萧衍“迟回久之曰：‘尔自图之，无令取笑千载。’”以往学界认为，萧纲对萧衍各种昏聩之行无能为力，事实并非如此。

有所承诺^①，萧纲在人格方面也是有很大问题的。至于后来之陈叔宝、李璟、李煜、宋徽宗之流，虽然也留下了一些艺术上很有可道之处的诗词或书画作品，而造成政治腐败，百姓流离，人民死于沟壑者无数，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终至国家败亡，则历史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以为萧衍、萧纲、萧绎这些人，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从文学史的角度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就其个人而言，不应该由于文学上的成就而予以谅解和拔高。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同宋末的蔡京，明末的阮大铖并无什么区别（蔡京的字也是一时之冠）。尤其对他们登上帝王宝座之后一些作品的评价，应同其真实的思想联系起来考察。应该承认，萧衍、萧纲、萧绎和萧统周围都曾团结了一批文人，其中有些有成就的诗人作家；他们也曾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主张。萧衍和萧统都曾真正团结文人，在继承文化传统、引导士风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萧统不但编了一部《文选》，其所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萧纲也团结了一批诗人，创作活跃，这一派的作品由《玉台新咏》而流传了下来。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偏爱，上层文人的创作题材也变得狭窄起来。当然，整个梁朝应还是有不少作品的，但其他题材的作品、其他作家的创作被不

① 林大志的《四萧研究——以文学为中心》一书指出，《梁书》、《南史》俱载台城陷落，萧纲见侯景“无惧容”，并举出五点说明其与侯景的关系和晚年的心情。如：一、侯景破城，几次欲要插亲信，萧衍愤而拒绝。“简文重入奏，帝怒曰：‘谁令汝来！’”则萧纲已倒向侯景一面。二、大宝元年四月幸西州，萧纲与侯景欢乐融洽，“酒阑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大笑，夜乃罢”。三、侯景初立萧纲为帝，二人为盟，曰：“臣固不负陛下，陛下亦不得负臣。”

同程度地抛弃了。诗赋不同于美术作品。中外历史上很多有名的美术作品，包括绘画、雕塑等都出自朝廷或国王、贵族的陵墓，他们在美术史上往往占有重要的地位或很大的比重。这些美术作品虽然出于宫廷或帝王、大臣的陵墓，但却是当时画家、雕塑家的作品。南北朝宫体诗却只是国君与皇族贵胄周围一批文人的作品，是自己创作，自己欣赏。齐梁两朝的文学是在被扭曲的情况下发展的。如果再放眼于整个民间的作品，萧纲等人的宫体诗并不能代表当时文学创作的整体情况。可惜的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作品未能留下来，因而历史被完全掩盖了。事实上像萧绎的嫉妒之心，既使有良知的文人也不但难出其右，也不敢出其主张的藩篱。

对于萧衍、萧纲、萧绎在诗赋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应该研究，也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客观地说，他们留下的诗赋作品为隋代以后诗赋的发展在艺术上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我的意思是不能把他们作为一般的文人作家来看，因为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命运、很多人的命运就在他们的手里。中国古代历来讲“知人论世”，不能把在他们的履历上占有很大比例的部分抛开不说，而只论他们的诗、赋；也不能不看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怎么想的，而只看他们论著中说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话。

今天无论评价哪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封建正统观念为准则。战国时燕王哙的让国，由于齐国的干预，继任的子之被燕太子打败。而齐国很快被田氏用大斗出、小斗入又自行节俭的办法取得民心，终究代替了姜齐。应该谁对老百姓有好处，谁对社会的安定发展更有利，就由谁来掌国家大事的决策权。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很多功业卓著的人由于“功高盖主”而被杀，这恐怕也是一些在乱世之中平定了天下，或当国家危亡之际独撑危局、使之转危为安的大功臣最终都走上“篡位”之路的原因。这也就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说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第八十二回）这是封建专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正由于这样，我们看曹丕、司马炎、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高欢（其子受禅）、宇文泰（其子受禅）、隋文帝等人，也不必以篡逆视之，只看其受禅之后是否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是否比以前好了。《魏书·序纪》之末魏收论曰：“帝王之兴也，必有积德，累功、博利，道协幽显。”所谓“积德”与“累功”意思甚为明显，其所谓“博利”，也是指更多的人得到好处。这里不因拓跋氏出于鲜卑族而以为其非华夏正统，而提出“积德、累功、博利”，以德相承的观点，是观念上一个很大的进步。实际上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文成帝拓跋浚、献文帝拓跋弘，尤其孝文帝元宏，在稳定北方社会、促进民族交融、发展生产、建立制度、推动北方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种种举措，东晋南朝诸帝少有及之者，只可惜宣武帝元恪以后政治腐败，内乱外患频仍，终至走向凌替与分裂。在这里并无正统与否可言。即使同姓中的继承，我们也不用管它嫡出、庶出、长子、诸子、直系、旁系，甚至也不必看用何手段取得继承权，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如果不使手段，那也就只有按封建宗法制度的规定，或无论上一代的国君如何昏聩，也就只有按他的安排办。这就是以前所谓逆取还是顺取的问题，这些都可以不论。一朝同一朝之间或一帝同一帝之间的转移交接（禅让也罢，继位也罢，武力取得也

罢)，自然是对社会的生产、生活的不良影响越小越好。从这一点上说，战争的夺取使很多人争战死于疆场，使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在血与剑中完成替转，代价太大。那么，禅让的办法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像魏篡汉之后奉汉献帝为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之上，逊位十五年而卒。魏明帝曹叡变服率群臣哭祭，谥曰“孝献皇帝”。景元元年（261）山阳夫人卒，魏王临于华林园，追谥其为“穆献皇后”。五年后，魏禅位于司马氏。则汉之皇、后经曹魏五世君，虽受监视不能自由，然而性命可保。晋代魏，奉魏元帝曹奂为陈留王，邑万户，居于邺，三十八年以后卒，谥“元皇帝”（以上并见《三国志·魏书·少帝纪》及裴注引《魏世谱》）。这确实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前朝的气数已尽，再无法维持下去，不能不改朝换代了。但改朝换代也不一定要死很多人。从这一点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实在是我国古代政治史上很了不起的一个时代，从魏代汉开始，以下的晋代魏、宋代晋、齐代宋、梁代齐、陈代梁，以及北朝的北齐代东魏、周代西魏、隋代周，全是禅让的办法。毕竟少一些生灵涂炭，京都官宦文人也少一些灾难。受禅之后封逊位的国君以王侯之爵，也走出了“你死我活”或“成者为王，败者为贼”的模式。虽然自刘裕开始，逾年即杀逊主，已不如魏、晋的开明，不过总算在改朝换代上多少体现了一种比较和平的方式。唐太宗之天下是“逆取”的，但就灭隋而言是除暴君救民于水火，至于其逼父杀兄，不如此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就其即位以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而言，真是一代明君，其贞观之治在后来千余年中成了理想社会的典范。可惜的是那些受禅让的国君除了曹丕、刘裕、萧衍的前期及隋文帝杨坚之外，有所作为者不多。如高

欢之子高洋，真是野蛮狂悖的禽兽。萧纲、萧绎之流，也只是想过做皇帝的瘾，热衷于帝王的生活和留名后世而已，把国家和老百姓的事完全置之脑后。兰陵萧氏家族崛起于军旅之中，建立了两个王朝，却都是短命的，总共不足八十年。自然，这和执政者本身的素质、思想、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同当时社会风气以及萧氏主要执政者都未能摆脱世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当时世家大族多以博学能文为尚，如瑯邪王氏、陈郡谢氏、彭城刘氏、吴郡陆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等，皆有家学可以炫世。梁初沈约上书梁武帝云：“凡粗有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竞行奸货，落除卑注，更出新籍，通官荣爵，随意高下。以新换故，不过用一万许钱。”（《通典》卷三）萧衍在萧齐末年也曾上书说：“且夫牒谱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梁书·武帝本纪》）可见萧衍对门第、家族之地位也十分重视。因此他便努力向“雅”的方面发展，以弥补其武人出身的缺陷。兰陵萧氏既热衷政治，又希望借此粉饰门第，抬高家族地位，所以，他们不是考虑如何治理国家，而是潜心于诗赋著述，其所交结及其几个儿子所相与，也多世族大家子弟，热心于讲经论学、吟诗作赋或编纂书籍。于是就造成了他们与整个家族在南北朝时期的重大失误与悲剧，社会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萧氏的这些风云人物虽都死于非命，不过在身后留下了一些诗赋文章。直到他们的子孙在唐代较安定的社会条件下，借着在南朝形成的家族地位，而对旧的家族传统加以扬弃，于是才有不少人在人格、思想和才能方面显出其优异的素质，并有所建树。如果说是历史玉成了屈原、曹植，使其成为诗人，则萧衍、萧纲、萧绎因为

自己的政治素养和过于热衷于文名，而未能成为卓越的政治家和彪炳史册的作家、诗人。萧绎在读书方面表现出的非凡毅力及他对文人的强烈嫉妒心，也都出于狭隘的世族文化观念，出于世族贵胄的情结。江陵之变时他竟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资治通鉴·梁纪》卷二十一）胡三省曰：“帝之亡国，固不由读书也。”一般说来此言不错，但胡三省并未看出萧氏父子因学问和文才的情结太重，以致弃本求末、因小误大的实质。

以上关于萧衍、萧纲、萧绎在文学方面谈得很少，因为我觉得就他们一生的“功业”说，文学占的比例太小。但不论怎样，他们都在文学方面留下了作品，而且在艺术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其独到之处，要研究齐梁时代的作家，避开他们。此外还有萧统、萧纶、萧纪，也都有文才，并且不同程度地留下了一些可以传世的作品。比较而言，萧统较为拘谨，作品没有乃弟的放荡活泼和具有新鲜感，然而他提出了对后代文学发展很有影响的观点，并且编成了体现自己文学主张的《文选》。他在创作上的缺乏创造性，我以为同他的很早就立为太子，同他的身份、经历有关。他是王储，又是诸多弟弟的表率，其母地位也不高，故潜心儒家经典。他在看到当时文学发展的新变、承认这种新变的前提下强调继承，认为行为不能过于放荡。其父在代齐以前是齐武帝萧赜之子萧子良的座上客，所谓“竟陵八友”之一，那时的诗歌创作自然可以放得开，但其登帝位之后的诗，则可称者少，与萧统相近。

关于梁代文论，周勋初先生提出“复古”、“通变”、“新变”三派说，影响很大。我认为这三种文学倾向之不同主要同这三

派的领袖人物萧衍、萧统、萧纲所面对的具体环境尤其是他们所处的位置有关。萧绎在侯景之乱以后所作《和王僧辩从军诗》、《藩难未靖述怀诗》、《遗武陵王诗》一改此前风花雪月的题材与华丽、轻艳的风格，临死写出《幽逼诗》四首那样悲凄的作品便是证明。实际上他们之间有一定的共同性。所以有的学者也通过划分阶段的方式来证明这三种文学主张在梁代的起伏消长。但并不是在某一种思想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别的主张便完全不存在了，上有源而下有流，每一个阶段上的特征只是哪一个起主导作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也是可以把梁代文论看作三派的。

实际上，裴子野、萧衍多从史的角度看文学。南朝修史之风盛，这自然也同世家大族以学问相尚有关，以为有家传之书，方使门户显赫。看《隋书·经籍志》萧子显有《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萧子云有《晋书》十一卷、《东宫新纪》二十卷，沈约有《宋书》一百卷、《齐纪》二十卷、《新定官品》二十卷，裴子野有《宋略》二十卷，张缙有《晋书钞》三十卷，谢绰有《宋拾遗》十卷，萧绎也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有《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萧衍则有《通史》四百八十卷（系敕吴均编著。萧绎的恐也非亲著），此皆有梁一代的史学著作。萧衍一代的关注点更多在文化方面，学术上强调继承，以示梁为礼乐文化命脉之所在，其关注并不专在文学上，这与南北对峙的局势有关。至萧统、刘勰才真正集全部精力于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在南朝文风变化下创作实践的总结。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之所以能在此后一千多年中一直受到重视，就在于这两部书都是此前一